

治谈判来解决。多年来中共一直呼吁两岸早日进行政治谈判,对谈判的名义、地点、方式等问题也仅表示“只要早日进行平等协商,总可以找出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而台湾当局却一直拒绝进行政治谈判,近一年来虽然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有所松动,但仍然附加种种前提条件,给人的感觉是欠缺诚意。

以谈判的方式论,从较低层次开始可以使双方都有更大的转圜空间,本来也未尝不可;但当前台海僵局既然起因于“国家与民族认同方面共识坍塌”这样的大分歧,还是以双方决策层的人出来谈,较易事半功倍;其实高层会谈也要先经过低层的沟通运作,不过这时的低层运作在性质上属于高层会谈的准备阶段,自应有一定时限。要保持两岸关系长期、稳定发展,也需要两岸高层互信互谅;本来,人与人之间要加深理解、增强互信,最简捷、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当面交换意见;要了解某地的实际情况,最方便、最可靠的方式就是到当地走一走、看一看。早在1956年,周恩来总理就曾公开表示,准备给予各种方便和协助,欢迎国民党军政人员回大陆省亲会友或考察。1957年,周总理又宣布:“我们可以同蒋介石的代表或同蒋介石本人坐在一起会谈,或者是他派人到北京来,或者是我们派人到台北去。”1978年以后,中共领导人更是多次表示欢迎台湾的领导人来大陆,也愿意以适当名义去台湾。1995年,江泽民主席再次重申:“我们欢迎台湾当局的领导人以适当身份来访问;可以共商国是,也可以先就某些问题交换意见,就是相互走走看看,也是有益的。中国人的事我们自己办,不需要借助任何国际场合。海峡咫尺,殷殷相望,总要有来有往,不能‘老死不相往来’。”这些话充满了诚意和善意,然而却没有得到对岸的积极回应。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现在,台湾岛内已经有很多有识之士在思考或谈论开启政治谈判之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高层互访的问题也再度成为热门话题。李登辉在其就职演说中也流露出想在这两个方面做些事的意向,然而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话说得含糊不清,且附加很多前提条件。其实这种紧张和戒惧的心态真是大可不必,中共并不要求马上谈统一问题,高层会晤也可以只是“相互走走看看”。问题的关键还是台湾当局到底想不想追求统一,到底还承认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双方就有了对话沟通的共识基础,由此出发还能找出更多的共识。只要双方真想走到一起,就一定能想出走到一起的办法。在这里,我们中国人绝对有足够的智慧。▲

两岸化解敌意的具体途径

文◎李义虎

众所周知,李登辉先生访问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事件,造成了两岸关系的高度紧张,并致使以第一次“汪辜会谈”成功举行、第二次“汪辜会谈”议定举行为逻辑发展标志的两岸关系积极势头几尽消蚀。

今年3月台湾“总统直选”落幕后,两岸关系的走向再度引起海内外的瞩目。舆论指称:“退一步,海阔天空。”但要真正做到这一步,又并非轻易之事。谁先退一步?退又往哪里退?

5月份李登辉发表的所谓“就职演说”表明,台湾当局大陆政策的基本框架没有发生本质性改变,全文只字未提“一个中国”字样,并仍表示“要继续推展务实外交”。也就是说,祖国大陆方面所关心的两个关键问题,仍是台湾当局回避的重点。当然,这个讲话在某些提法和语气上作了若干调整,有意冲淡同司马辽太郎谈话的风格。在此之后,李登辉又发表多次讲话,时而口气强硬,时而态度暧昧。

于是,不难发现,台湾当局的政策具有了非常明显的“二元论”特征。两岸关系的局面,从政策意义上讲,呈现为台湾方面的“独台二元论”与祖国大陆的“中国统一一元论”在理论、政策和实践诸领域的全面对峙。

在这样的情形下,对两岸关系进行政策性分析,以找到化解敌意、增加互信和建立政策有效对接的具体途径,便具有了重要意义。

台湾当局大陆政策“二元论”困境

台湾当局的“二元论”,特征非常明显。诸如:两岸政权“互不隶属”、“分裂分治”、以

“对等政治实体”为两岸关系定位，以及“阶段性两个中国”、“经营大台湾，建设新中原”等等。

在这里，有必要对台湾当局的“政策框架”做一点分析。

所谓“政策框架”的一个方面，是大陆政策与“务实外交”的政策优先程序关系，也就是孰重孰轻的问题。实际上，长期以来，台湾当局对它们的处理方式就是把政策目标设置在“并行不悖”、“进入良性循环”的期望上，试图以走高空钢丝的特技来处理两岸关系。一方面在政策上也显示“追求”统一目标的意涵，例如李登辉说自己讲过100多次反“台独”的话，最近又讲“没有必要，也不可能采行所谓台独路线”；但另一方面，又强调“隔海分治”，谋求“对等政治实体”的地位，摆出了分立门庭的充足架式。他一方面抛出缓解两岸关系的气球，另一方面又要“继续推行务实外交”。

这种“政策框架”必定使他们标榜所追求的政策终极目标受到影响。“二元论”政策所留下的一种巨大的疑问便是：到底是要统还是要独？统是有多大诚意的统？独又是有多大成分的独？到底是要缓解两岸关系，还是仅使这些说法停留在表面的、应付的水平上？

笔者以为，近年来台湾当局所推行的“弹性务实外交”，还是与其在岛内大搞“弹性内政”相配合的，在戏路上早已变成了一幕有脚本的“双簧戏”。所谓“弹性务实外交”，便是要在国际社会谋求取得“国际人格”，拓展更大的政治性质的“国际空间”，目的在于用国际因素和多样化的外部环境反身制衡祖国大陆。而所谓“弹性内政”，便是在“国家认同”和统独问题上，由态度暧昧转为倾向于不被统一的否定性选择。特别是可以借台湾社会多数人“维持现状”的中性要求，做与大陆抗衡的“非良性导向”。由此，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在本质上日趋变成诱使台湾问题国际化，大陆事务“外交化”。它要充分利用“维持现状”的二元选择可能，使“弹性外交”和“弹性内政”两方面举措相加，确立自己与大陆平起平坐的二元角色定位。

目前，台湾当局表示愿意“追求统一”，以“一个中国”为虚幻的终极状态，便更为突出“统一过程”，而避开对“一个中国”的现时性公开表态（如许水德诠释“一个中国”为“统一的中国”）。这里，“阶段性”这一时间跨度绝非偶然用词，“先分后统”这种顺序关系也值得注意。台

湾当局要充分利用时机，“重返国际社会”，大搞“务实外交”，以通过国际行为来确立“对等政治实体”的地位。

这种“政策二元论”极易产生各种政策性的矛盾冲突。这种政策事实上已经暴露了自身的逻辑矛盾，并使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陷入了困境。

台湾当局奉行以“二元论”为特征的大陆政策，是由目前在统一大局中台湾所处的地位决定的。台湾与大陆在人口、面积上不成比例，“综合国力”和外交成就，大陆明显领先。但台湾当局又挟持“经济实力”和“宪改”等政治资本，不甘居于下风。因此，一方面它怕在统一过程中被“矮化”，另一方面又要“导引”大陆的发展方向。“二元论”政策设置恰好是一个平衡点。它的思想根源也是深刻的。在台湾社会，存在着“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的矛盾和冲突，它们不免会反映到政策及政策行为上。特别是在“本土化”和“宪改”过程中，在“统独之争”的背景下，许多处于潜流状态的东西浮上了台面。另一种思想根源是反共意识与统一要求的矛盾，例如特别强调“制度之争”，实际上是反对“一国两制”，要搞“以民主、自由、均富统一中国”（貌似“一国一制”）。所以说，“二元论”的政策设置恰好也是思想意识矛盾的平衡点。此外还有国际环境因素。台湾存在着经济发展与（在国际上）政治孤立之间的突出矛盾，也要寻找到一个自身位置的平衡点。

而祖国大陆所坚持的统一立场和政策可以概括为“中国统一一元论”，而其“政策框架”可以用“一元论辩证法”加以说明。中国政府关于国家统一的目标是既定的，即：中国统一是历史的必然，实现国家统一是基本的国家目标之一。祖国大陆对于台独和各种分裂行为绝不容忍，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毫无妥协余地。祖国大陆认为，台湾当局积极从事“务实外交”，在国际社会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是对国家主权和“一个中国”原则的直面挑战，必须采取强有力的反制措施。

在祖国大陆的“一元论”面前，台湾当局的“二元论”政策无论如何解释，都只会显得苍白无力。

政治交集和政策对接问题

如前所述，“二元论”和“一元论”的对峙是两岸在政治上无法产生交集、政策无法对接的理论根源和思想根源，它们导致了政策视野及方法的不

台湾政坛黑白难辨

文◎郁辛

台湾“黑道”气焰之盛，为害之烈，实在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李登辉在一次“国民大会”答复“国代”建言时，承认黑道问题是影响台湾经济发展重要的非经济因素，当场要求“行政院”全面扫黑，并在6个月内见到成效。于是，台湾警方立即在台北与高雄逮捕几名帮派分子，并马上用直升机送到台东县海外的“绿岛监狱”，收押禁见。“警政署”随即对外宣布，从9月1日起发动全力“扫黑”。然而，社会大众对这一旋风式的“扫黑”表示怀疑，认为这是为了兑现李登辉提出6个月内整顿治安的“支票”，只是一场“作秀”。

台湾的官场与金权已经纠缠难分，台湾的黑道藉着政商勾结、黑金互依的运作，早已由乡镇发展到县市，更由县市而窜升到省市“议会”及“中央民代”机构。据岛内媒体透露，台湾现有800多位省市乡镇“民意代表”中，有300多人具有前科或黑道背景。台湾政坛出现这种“黑白不分”、“正邪莫辨”的现象，已非一日之寒。

同。

政治上不能产生交集，政策上便无法实现对接，关系僵局便难以突破。在谈到建立两岸关系良性互动时，人们常爱说：“要发挥政治智慧。”这固然是一种好心好意，但政治智慧如何发挥出来？它又具体体现在哪几个方面？这不是仅靠好心好意，而是要用精巧的政治设计和大胆的行动去完成的。

先要将“交集点”和产生交集的运动空间搞清楚：

1、“一个中国”的原则必须坚持，并作为两岸关系发展与国家统一进程紧密有效挂钩的枢纽。即：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只能坚持“一元论”。“一个中国”自然是“历史的、文化的、地理的”概念，但必须承认它也是国际法主体和国际政治行为主体的概念。这些是“一个中国”内涵的内化指

台湾的金权勾结，黑道猖獗，早已是舆论界一再痛切指陈的现象。据统计，全台湾的卡拉OK有90%属于非法经营，警方根本无法取缔。因为每次警方去采取行动，必然有“民意代表”站在门口把关，许多警员见此情形干脆也和黑道挂钩，坐地分赃。最近有一名竹联帮分子为儿子娶媳妇，席开数百桌，前往祝贺者不但有政府高官、地方名流，还有许多“民意代表”，前往探访的媒体记者也有300多人。社会大众悲叹：台湾社会真的是病了。

当今台湾社会风气污浊，缺乏安全感，主要因为官场的源头不清所致。近年来，黑道问政之说不绝于耳，尤其在台湾中南部，不少帮派头目通过选举进入“议会”，还有黑道老大成为“议长”，黑道寄生于政坛已是根深蒂固，要想根除，当政者恐怕也承受不了。

台湾的所谓“民主选举”，实际上走的是一条邪路。国民党一定要“胜选”，就要找能当选的人出来竞选。而黑道在地方上最有势力，也最会敛

标。在此前提下，外化指标则可弹性处置，预留交集空间。

2、“务实外交”问题应转至“国际空间”问题的理解。“务实外交”问题目前仍是两岸关系能否转好的试金石；而对于“国际空间”问题，大陆方面曾明确指出：“对于台湾同外国发展民间性经济文化关系，我们不持异议。”凡是涉及到国家主权的“政治性空间”，大陆一概坚持原则性立场，绝不容许借机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分裂意图。而对于民间性的“非政治性空间”，则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有灵活处理的可能。这之间就有一种区隔和“度”的衡量与处置。

以上两个关键问题，只有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作法，寻找到“适度”的所在，才能使两岸产生政治交集，进而发生政策对接。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的认真探讨。▲